

中共通海县委书记张盾同志被害经过

胡 涛

1950年7月，中共通海县委书记张盾同志到东区指导征粮工作。首先找有关同志交谈，掌握了解全区的基本情况。7月30日，他叫区委书记杨树藩同志和我在区人民政府后院西南角的小静室开会，研究各村抗粮地霸，准备镇压部分罪大恶极的抗粮大户。因逐村分析研究，会议从早上8点开到下午5点还没有研究结束。晚饭后，张盾同志说：整天研究，头脑昏闷，出外散散步，顺便察看一下国民党时期多年没有修好的杨广抽水站。我们三人看了抽水站，认为国民党时期决定主水沟用土方砌成，占良田过多。如果改用距离抽水站一二百米的石头来砌，要少占几十亩良田。我们还爬上凤山查看了取石头的地点，然后经凤山心回区人民政府。

回到区人民政府，天已乌黑，我们又继续开会研究。当天晚上，何明同志在区人民政府后大院里召集杨广南村北村的居民正副组长汇报征粮情况。钱正华同志在区人民政府旁的武庙召开民兵会。8点多钟，张盾同志到电话室接电话，杨树藩和我闲谈等着。电话是各区汇报征粮进度，提出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意见。所以接电话的时间较

长。大约 9 点钟左右,有两个化装成解放军的匪徒来区人民政府找专署的杨主任,站岗的卫兵检查了他们的证件后,告诉他们,没有杨主任,只有县委书记张盾同志在家。他们说:如果杨主任不在,就找县委书记。于是,站岗卫兵告诉张盾同志的警卫员李永忠同志,带两个化装成解放军的匪徒见张盾同志。到了电话室,他们立即用十响枪射杀了正在接电话的张盾同志,另外一名匪徒向站在电话室外边的李永忠射击,没有射中。同时在区人民政府大门外埋伏的匪徒也向站岗的战士岳修祥同志开枪,岳修祥同志受伤昏倒在地,两个杀害张盾同志的匪徒乘机逃跑。区武装副队长李高崇起同志听到枪声,立即赶到大门口,也被匪徒枪击牺牲。这时,参加开会的正副居民组长蜂拥而出,混乱一团。区里的干部和区武装战士有的盲目地还击,有的在混乱中冲上凤山。一阵混乱枪声逐渐停下来后,坚守在区人民政府的同志,小声叫喊着找张盾同志,杨树藩、吕韵珍、钱正华和我遇在一起,大家有个共同的愿望,一定要找到张盾同志。于是有的继续寻找张盾同志,有的到电话室打电话向县上报告东区人民政府发生的情况。到电话室的同志发现张盾同志已牺牲,躺在地上。电话已被匪徒截断,打不通。此时我们只有十多个同志,区人民政府不易防守,我们只好抬着张盾同志的尸体,转移到杨广早街心的三层楼以便防守。因情况弄不清楚,人又少,我们多次向县城方向鸣枪联络,告诉我们还坚持自卫。有一个同志跑出区人民政府,到云龙村向在云龙村工作的蔡树德区长报告了杨广发生的情况。蔡树德同志带领云龙

村的民兵，首先赶到杨广找到我们。到下半夜，县城武装也到杨广，一齐守卫着三层楼。以后就没有发现枪声。

天亮后，杨家营的民兵来区上探听昨晚杨广发生的乱枪时说：昨晚深夜有一部份解放军到农协会，说他们有重要任务，要农协会派民兵用船送他们到二街。这时，我们才知道是美蒋特务化装成解放大军，制造了假证件，蒙混站岗的战士，谋害了张盾同志。



解放初期通海人民政府 勤政为民的几件事

吕 韵 珍

通海县是1949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二支队司令员余卫民率部队入城和平解放的，13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1950年1月15日成立人民政府。新政府建立后，艰苦朴素，勤政爱民的作风，一直在人民中传为佳话。

1949年12月12日晚7时，中共通海县工委李志敏同志在县城文星阁街开明士绅曾吉斋先生的家中，召集中共党员，民青盟员（即MC）约50余人开会。李志敏同志告诉大家：“通海县已经解放，军事管制委员会即将成立。我们要接管旧政权，建立人民新政权；我们要从“地下”转为执政党。新政权建立后工作很多，当前，主要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开展拥军，发展生产等。任务十分艰巨，希望革命同志要服从组织分工，与部队配合，投入火热的巩固新政权的革命斗争。”

1949年12月13日，边纵二支队司令员余卫民在县城武庙（县幼儿园）内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旧县政府科长

以上人员，旧参议会成员、部份开明士绅也列席会议）。会上，正式宣布：通海已经解放，旧政权已被废除，通海县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江凤（二支队干部）任军事委员会主任，李志敏、胡兴富任副主任，曾志斋、艾云程（二人均为统战对象）任委员。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三个组：1. 政权筹备组，由李志敏、胡兴富负责；2. 城防保卫组：由曾继森和二支队九连长负责；3. 清理接收组：由陈平（女，二支队干部）、吕韵珍负责。1949年12月16日边纵二支队奉命开赴昆明，江凤、陈平和二支队九连长随队离通。

艰苦朴素 一心为民

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的4个月中，省、地、县政权正在进行接管和筹建，财政、税收刚开展工作，经费十分困难。我县的干部、战士从未发过工资，每天仅能吃上两顿糙米饭，有时大米紧张就吃蚕豆拌饭，多数同志买不起布鞋就穿草鞋。睡觉时床上垫的是草席，盖的是一条烂棉毡，干部战士一样艰苦。

1950年1月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率部追歼国民党第八军、二十六军路经通海，也是和地方领导干部同桌吃的糙米饭。出发时，为了争取时间，朱家璧副司令员把所骑战马留给人民政府暂用，徒步率领部队走山路追赶逃敌。

胡兴富同志担任县人民政府主席后，生活仍很朴实，天再冷也总是穿一件旧的兰布对襟棉衣。他始终保持唱革

命歌曲的优良传统，只要不下乡，每天清晨都集合人民政府干部战士，带领大家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嘹亮的歌声，充满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革命气氛。

刚解放时，李志敏、胡兴富、曾继森等几位县的负责同志工作十分繁重，白天下乡下基层联系和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晚上还要在城里和同志们开会，研究布署工作。由于他们这种忘我的精神，带动了全体干部战士都积极工作。平时人民政府只留一位负责同志带领守电话的小同志和警卫人员处理日常事务。当时百废待兴，事务纷繁，重大事项均在晚上集体研究决定，经常通宵达旦，秘书室仅吕韵珍同志负责，因人少事繁，就聘请王汝德老师协助工作，王老师虽是民主人士，但同样不计报酬。

积极筹集粮秣 解决军需民食

刚解放的通海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粮、钱、物大部份掌握在少数资本家和官僚地主手里，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新成立的军管会除了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外，更重要的是筹集军需民食。为保证县级各部门、护乡团、基干队和各乡镇干部战士约700余人的粮食供应（1950年2月人民解放军二野十三军俘训处进驻通海后吃粮人员猛增2000余人），军管会为此成立了由吕韵珍同志负责的“通海县粮秣供应委员会（1950年5月成立的县粮库前身），该会全体工作人员，日以继夜，冒着生命

危险，千方百计筹集调运各乡镇积谷，加工粮食，保证了当时军需民食的紧急供应。

惩治不法奸商 维护政府威信

1950年，人民政府召开工商会议，宣布市场交易一律使用人民币，禁止其他货币流通，但由于个别不法商人作祟，他们只要半开（旧银元）不要人民币，影响人民币的流通。人民政府经过调查落实后，对拒收人民币的两家商号“老板”进行拘留审查。他们的家属吓慌了，就以和×××是本家，和×××是翁婿等借口，找亲戚到人民政府内求情，要求释放，都遭到严词拒绝。人民政府的干部真正做到秉公办事，不讲私情。后经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为了维护人民币的声誉和在市场的流通，对他们每人处以罚款人民币500万元（旧人民币、即今500元），限期三天交清。在罚款交清并作公开检讨认错后即予释放。这样一来，人民币在市场上立即畅通无阻，无人敢于拒收。

惩治恶霸地主 调解人民内部纠纷

人民政府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受压迫剥削的冤屈要申，人民内部的一些纠纷需要解决，为了满足群众的强烈要求，在县委领导下，成立了人民法庭和县调解委员会。

人民法庭成立后，接受了云龙村全体农民的请愿，逮

捕了全县闻名的恶霸地主蒋小脚，废除她家以买田买至绿水而霸占云龙村农民多年所开垦的湖边田的封建契约，惩治了她的恶霸行为，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县调解会成立后，首先废除旧政府维护剥削阶级的法律、法规，砸破“衙门吃钱”、“差役勒索”等不合理的诉讼制度。群众诉讼一律不收费用，更不准敲诈勒索。为了方便群众申诉，专门聘请一人为广大工农群众免费书写申诉书，群众的申诉，县调解会即时办理，基本上做到件件有结案。如黄脚管两族群众的山林纠纷，上午报案，中午即由调解会负责人带领有关人员赶赴现场，调查落实，并召集双方当事人，晓以人民内部应以团结为重的大义，分清是非，合理解决，避免了一起即将发生械斗的流血事件。

团结友爱 同甘共苦

解放初期，由于保密，在日常生活中一律不喊“官衔”，多数同志都只喊姓或“绰号”，如大明、小李、老吕、钱二等，这样喊既能保密，大家又感到亲切。

人民政府刚成立时，由于地霸及残匪武装未全部消灭，阶级斗争十分剧烈。为了加强戒备，每夜都布置岗哨和巡逻，领导干部分别参加夜间巡逻，和战士们同甘共苦。

解放初期，干部和战士都建立了诚挚的革命感情，干部关心战士，战士敬爱干部，干部夜间为警卫员洗衣服，教警卫战士和通讯员学文化、学时事是经常的事。

新政权建立后，政府工作人员的待遇是供给制，除供

伙食外，每月发给旧人民币1.6万元(折合现人民币1.6元)津贴作为日常生活费用。伙食分大灶、中灶、小灶三种，按规定张盾和李志敏二同志都可享受中灶待遇，但他们自愿和全体干部战士一起吃大灶伙食，继承了党的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



平息东区“四·一八”土匪暴乱的回忆

胡 涛

1949年12月通海县解放后，通海六村坝一带的土匪全部招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余卫民部一齐参加昆明保卫战。战后，在整编训练中，白广金、期永金、李绍岗等土匪头目请事假回家，长期不归队。李绍岗暗里组织部分不愿改邪归正的坏人到新义一带（当时属华宁县），夜间爬屋抢人。1950年正月十三日（新历2月27日），岳六甲庙会，李绍纲在张家营与杨家营之间的螺螄山上聚众赌钱，护乡团和东区武装强行要他归队，他持枪对抗被击毙。不久，白广金、期永金、雷家昌等匪首藉口李绍岗被击毙一事重新上山组织土匪武装与人民政府对抗，多次写恐吓信给东区人民政府，扬言要攻打东区人民政府，要活捉某某人。当时谣言四起，“什么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征完粮后老百姓无饭吃”，等等。东区人民政府对土匪的扰乱是有所重视的，随时掌握土匪动向，晚上加强岗哨和巡查。

1950年4月18日凌晨，县委电话告诉东区人民政府：西区区长李定一同志被土匪绑架，要我们提高警惕。天亮

前，站岗的同志报告大小新村方向有枪声。当我们正从各方面了解分析匪情的时候，参加小新村工作组的武装战士丁传卫突围出来报告小新村工作组被匪徒包围。

当时，国民党第3军和26军被俘军官有一部分在杨广一带俘训。押俘部队的解放军少，押俘任务较重。经过与押俘部队商量，部队抽出一个班的解放军配合东区人民政府全部武装，组成两个分队，分两路去救援小新村工作组。一路由虎山南面，顺山脚经蔡家山到小新村，另一路由金家湾顺山脚到小新村。当两个分队进入小新村大寺西面田坝时，由于我军对情况分析估计不足，被埋伏的匪徒包围。匪徒人多，地形有利，我军被动挨打。此时小新村工作组所在地已被土匪占领，工作组长马林同志和组员张丽珍同志惨遭杀害。为了减少伤亡只好从蔡家山方向，顺云龙大河突围。突围经蔡家山时，又遭蔡家山叛变民兵伏击，区武装战士鲁国祥同志牺牲。此时我们才发觉不是单纯的土匪问题，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暴动。于是立即决定由解放军分队击退虎山上的土匪武装，占领虎山，保卫区人民政府的民兵武装占据凤山。东区人民武装击退蔡家山的叛匪，赶回区人民政府。住杨广一带的俘虏军官全部集中在杨广早街心的广场上，筑起工事，用自动火力封锁控制，宣布任何人不准移动，屎尿就原地拉。当区人民武装赶回区人民政府，路经鼠街子时，又遭大新村反动乡绅头目郭增寿率领的反动武装阻击，经过激烈战斗，击退郭匪的阻击，缴获马林同志使用的美造花号枪和其它一些枪支，及时赶到区人民政府。

大约是中午前后，郭增寿带领的反革命武装，大举向区人民政府所在地杨广进攻。分散在杨广、下村、晚街等村的匪徒也用乱枪配合射击。在匪情非常严峻的形势下，区人民政府武装和押俘部队的部分解放军集中向郭增寿匪部反击，猛打郭增寿匪部。由于郭增寿的土匪武装多数是被迫出来的乌合之众，一听到猛烈的机枪声，就丢枪逃命。其他各路匪徒见郭增寿匪部败退，不敢坚持反抗，转头就跑。由于我们抢占了东区坝子里的虎山和凤山，才控制了东区坝子的局势，东区反动派的暴乱才没有按他们的计划得逞。下午7时，县委通知东区人民政府和人民武装进城，俘训队撤至城郊、黄龙一带，后来知道“四一八”反革命叛乱是有美蒋特务、有土匪、有反动豪绅三位一体组成的反革命叛乱。

捉拿军统特务皮绍晋小记

胡 涛

1952年12月30日下午，我在张老村财神寺召开全区村干部会议，研究讨论发展农业生产和宣布坝区实行土地改革两件大事。会议特别强调防止外地坏人躲藏的问题，并向全区农民群众和村干部约法三章：一、外地人来家住宿，要向农民协会报告；二、隐藏外来人不报者，当隐藏坏人论罪；三、村干部隐藏外来人或知道某户隐藏外地人不报者，罪加一等。散会后，出财神寺门外，我走在普丛村文书王朝元等同志的后面。王朝元同志向其他同志说：汉人屯×××亲戚家住着一个昆明来的人，是否需要向区上报告？我听了走上前问王朝元，你说的昆明人来汉人屯有多久？王说：具体时间我不知道，不过住的时间已是数月了。我听后感到有些奇怪？过去几个月，我们工作组就住在汉人屯，我是工作组长，上下两村有几户人家，每户有几人，那几户住外地人，大人小孩我都知道，怎么不知道这个昆明人。

第二天（1952年1月1日），天还未亮明，我和飞朝仁同志就到汉人屯，叫来上村文书陈永贵和下村民兵队长吴家来，四人到上村×××家查看那个昆明人，当查到大

楼左边的房间时，房门锁着，敲门后，大约两分钟，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开了门，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即时开门？他回答是睡熟了，没有听见敲门。我们全面检查了房间，地上有一些撕得不很碎的纸，我们把这些碎纸拼凑起来看，是一封同保山地区做药材生意的信件，看起来他好像是做药材生意的人。另外房间里放着五公寸高的一罐大便。根据这两个疑点，我们就把他带到乡政府进行审问。开始他交待是一个医生，解放后失业，所以到这里来。我们告诉他，解放后医生不会失业，而是医疗工作很忙，他仍然巧辩。我们要他解释“一罐大便”和“长期隐藏不露面”的问题，他才有些慌乱。招认了他叫皮绍晋，是军统特务，他的弟弟也是特务，他的父亲是吴学显部下的军官，他出生昆明，前久躲在芭蕉箐，随后又来汉人屯。中午，我们带他到区人民政府，用过新年的饭菜给他吃，给他香烟抽，多次反复交待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待国民党军政人员和特工人员“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宽大政策，希望他认真说清他的问题。最后，他解除了思想顾虑，说出他是军统少将特务，军统云南站副站长，站长是沈醉。解放前夕，调重庆中美航空检查所当副所长。交待到这里，因为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我们就不好审问了。这时虽是深夜，但事关重大，我及时去找通海县劳改大队大队长高乃志（劳改队在四区修通建公路）谈了抓获军统少将特务的情况，请劳改队看管比较保险。高乃志同志认为他们看管犯人任务重，不同意我的意见，要我们自己看管。这样，我们只好连夜调可靠的青年民兵加强看守。第二天向通建公路修建指挥

部借了一辆大卡车，押送县城交公安局王连增同志。在公安局，王连增同志和我重新对他进行审问，确认是军统少将特务时，王连增同志马上打电话告诉地委。审问还未结束，地委就派小车来把他接走了。

注：皮绍晋现任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河西的土地改革运动

杨文权 董永年

1951年，中共河西县委、县人民政府在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基础上，10月初，县委书记王云、县长张玉轩率工作组到新增乡进行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试点。11月，中共玉溪地委调已完成土改工作的呈贡县县长迟德亮率105名土改工作干部来支援河西。11月中旬，在新增乡土改试点取得初步经验后，集训干部，学习政策文件、介绍呈贡土改重点乡的经验 and 河西新增乡土改试点经验，同时召开全县农民代表会，宣布全县44个乡分两批进行土改。第一批铺开一、二、四区平坝的26个乡，工作队共300多人（呈贡土改工作队105人）；在第一批完成征收没收后，铺开第二批三区和宝泉直属乡（今峨山小街镇、宝泉乡）以及二区的团田、四区的曲陀关、清水河等18个乡。1952年5月初，全县土改基本结束，转入春耕生产和中耕夏锄。秋收秋种后，全县44个乡又进行了土改复查，填发土地证，充实区乡领导班子等工作。11月，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

河西县的土改工作，不论是试点或是第一批、第二批，

都经历了串连发动、划分阶级、征收没收、分配果实四个阶段，具体做法是：

一、扎根串连，深入发动群众，从政治上打垮地主阶级。

全县宣布实行土地改革后，地主阶级曾进行了垂死的挣扎。有的地主恶霸公开造谣威胁群众说：“哪个斗争我，我以后要报复。”新增乡的反革命分子甚至用私藏的枪，深夜向土改工作组张县长住的楼上开枪。苏家营乡一个反革命分子篡夺了农协会的领导权。地主分子师小脚混入农协会，公开破坏政府法令，抗交公粮，包庇其他地主。许多地主则千方百计地找“防空洞”（主要是还未发动起来的贫雇农及其亲友），分散隐藏财物。突出的如十街乡小营村50户贫雇农中就有36户为地主藏东西。针对这些情况，中共河西县委、县人民政府坚决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打垮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采取先轰开，后深入的方法，发动农民群众上街游行，在县城棉花场召开有一万多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宣判枪毙一批罪恶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接着各区、乡又分别召开斗争恶霸地主大会，采取打击反动顽固的大地主，争取中、小地主守法的策略，运用斗争、训话、人民法庭审讯相结合的方式，镇压反革命分子，在政治上对地主阶级进行严厉地打击，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同时，做深入细致的扎根串连、发动贫雇农、团结中农的工作。在串连发动中，各乡都是在扎根串连起一批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后，又通过他们去扩大串连，并开展家庭互助和